

靳思彤 著

# 前 线 大 军

## 征 战 亲 历 记

中共党史出版社



# 刘邓大军 征战亲历记

靳思彤 著

中共党史出版社

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刘邓大军征战亲历记/靳思彤著. —北京:中共党史出版社,2009.1

ISBN 978-7-5098-0145-1

I. 刘… II. 靳… III. 第二野战军 -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 - 史料 IV. E297.4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8)第180903号

## 书 名: 刘邓大军征战亲历记

---

作 者:靳思彤

责任编辑:姚建萍 李树泉

出版发行:中共党史出版社

社 址:北京市海淀区芙蓉里南街6号院1号楼

邮 编:100080

网 址:www.dscbs.com.cn

经 销:新华书店

印 刷:北京同文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
开 本:170mm×240mm 1/16

字 数:538千字

印 张:34.5 10面前插

印 数:1-6000册

版 次:2009年1月第1版

印 次:2009年1月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5098-0145-1

定 价:53.00元

---

此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,请与中共党史出版社发行部联系  
电话:82517249,82517244



1949年4月21日凌晨，人民解放军第二、三野战军发起渡江战役，迅速突破蒋军的长江防线。这是刘伯承、邓小平亲临前沿，部署渡江作战。



刘伯承在淮海前线指挥中心的作战图前，细心察看图上的浍河流域。



1948年11月16日，淮海前线成立总前委，由刘、陈、邓、粟、谭5人组成。刘、陈、邓3人为常委，邓小平为前委书记。左起：粟裕、邓小平、刘伯承、陈毅、谭震林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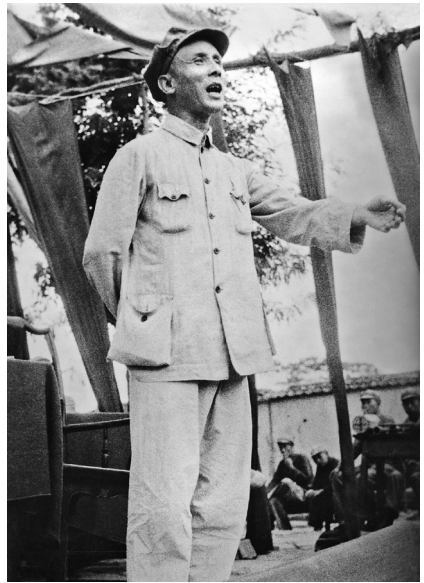
1945年8月25日，刘伯承、邓小平乘坐美国飞机，由延安飞抵太行山黎城长凝机场，飞机降落后留影。后排：刘伯承（左五）、邓小平（左四）、陈毅（左三）、杨尚昆（左二）、陈赓（右一）、肖劲光（右二）。前排：李富春（右一）、聂荣臻（右二）、蔡树藩（右三）、李伯钊（右四）。







1947年12月，刘伯承司令员在大别山作四个月总结报告。



1948年6月，邓子恢来到中原军区工作。这是他在宝丰会议上作财经工作报告。



陈赓司令员进至昆明城，在郊外与卢汉亲切握手。左立者是政委宋任穷。



1945年11月1日，邯郸战役活捉蒋军第11战区副司令兼40军军长马法五。1946年2月26日，刘伯承携马法五去新乡军调小组前合影。邓小平（左一）、刘伯承（左四）、薄一波（左七）、高树勋（左五）、马法五（左三）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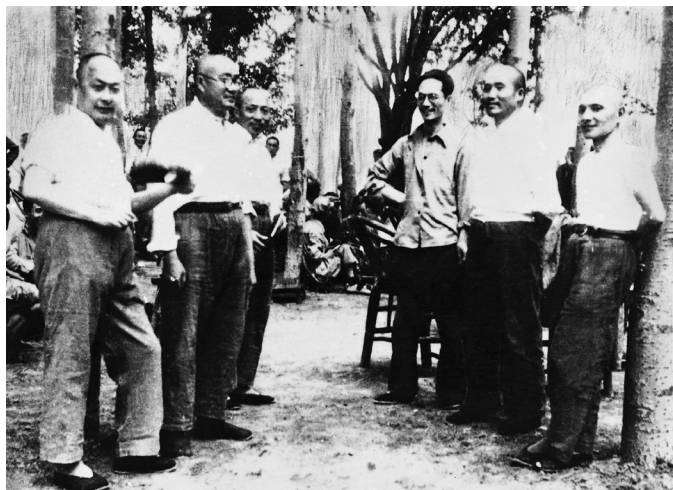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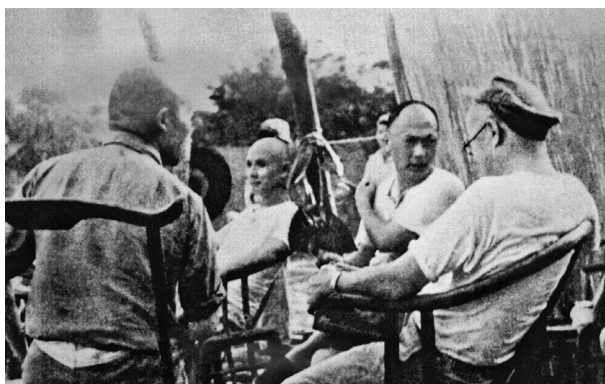


1949年12月5日，第一野战军十八兵团由陕西进入四川。这是西北军区司令员贺龙（左一）、十八兵团司令员周士第（左二）和西北军区副司令员王维舟翻越秦岭后研究作战部署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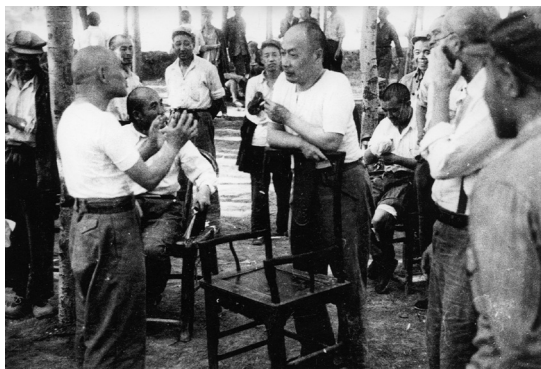
1947年9月5日，刘邓大军进入大别山第五天，邓小平在光山县北向店连以上干部会上作报告，阐述坚持大别山斗争的重大意义。

1948年6月14日，陈毅由延安来到中原，在宝丰皂角树村向中原驻军团以上干部传达报告。右起：刘伯承、陈毅、邓子恢、李达。



1948年6月，华东、中原两大野战军会师。陈毅从延安来到河南宝丰，在团以上干部会前留影。左起：陈毅、刘伯承、张际春，右起：邓小平、李达、李雪峰。





1948年7月，宝丰会议中间休息时，邓小平政委、陈毅司令员在交谈。



1948年3月14日，洛阳城获得解放，此次战役成为华东野战军陈士榘、唐亮兵团和中原野战军陈赓兵团联合作战的典范。图为两个兵团的指挥员陈士榘（左）、陈赓。



1948年4月，河南叶县整党会议期间中原军区部分军以上领导干部合影。左起：李达、陈士榘、谢富治、唐亮、刘伯承、张际春（后）、杜义德（前）、阎红彦（后）、王近山（前）、陈锡联（后）、姚继鸣（后）、曾绍山（蹲者）、韦杰、苏振华（后排右一不详）。

1948年8月，中原野战军在副政委张际春主持下，为每个纵队编写一本《南征一年》。这是全体人员在宝丰县大连庄合影。前排蹲者右起：胡痴、艾炎、曾克（女）。后排站立者右起：芮子久、殷步实、裴植、严少陵、周承术、孔更、葛洛、何超、靳思彤（本书作者）。







1949年11月向大西南进军时，指挥部驻在长沙。11月8日，野战军机关冒雨开进刚解放的常德城，司令部设在白云中学，刘邓首长就在这里作为临时指挥部。右起：刘伯承、张际春、邓小平。



在修建甘孜到昌都的工程中，18军政委谭冠三在参加劳动。



1949年10月28日，第二野战军领导到达武汉时，刘伯承与第四野战军研究进军问题，后排右一为林彪、右二为刘伯承。

1951年4月，西藏地方政府代表团赴京谈判途经重庆时，受到邓小平（右）等西南军政首长以及群众的热烈欢迎。





刘伯承和夫人汪荣华合影。



刘伯承和夫人及子女合影。



邓小平和夫人卓琳合影。



邓小平抱儿子胖胖(邓朴方)合影。







# 前 言

---

每个人都拥有金色的童年，奋发向上的青年，富有成熟感的中年和充实安详的老年。

我已进入“货真价实”的老年。我有很多老年朋友。在京离休的老朋友中，尚在人世的还有十几位，都是上个世纪40年代就在一起共命运的老家伙。60年弹指一挥间，现在都是80岁开外的老人了。

人老了，记忆力衰退，做事“丢三落四”，这就是老年人的弱势。但是，人虽老迈，大都有“忘近记远”的特点，对童年和青年时期的事情，记忆犹新，历历在目，这又是老年人的优势了。

我们在京的这些老家伙们，经常有电话往来，每年还要聚会一次。每次聚会除谈论国家欣欣向荣的巨大变化外，谈论较多的还是我们亲手创造和亲身经历而又出现辉煌业绩的“刘邓大军”。

刘伯承、邓小平首长共同统领和指挥的这支部队，他们二人是“一根扁担两肩挑”，时而换肩，时而分挑，同心协力、亲密无间地带出了这支英雄部队。后来在大反攻进入蒋管区的历史转折时刻，在群众的赞扬声中就逐渐形成了“刘邓大军”这个称呼。

我们这些离休的老朋友，都是刘邓首长的老部下。解放战争初期，有的在司令部工作，有的在政治部工作，有的就在刘邓身边服务，大都知道一点刘邓首长的事情。我们之间，他们大都是“三八式”（1938年，抗日战争初期参加革命），唯有我的资历较浅（抗日战争末期参军），但我读

书时间比他们长了点。

1921年冬，我在河南省焦作市站区东王封村出生，高中毕业后，因母亲病故，父亲患病，就在焦作市母校当了小学教员。我们家乡地下矿藏丰富，父亲曾经营两个煤井，并在河南长葛、许昌开办两家煤炭公司，家庭经济比较富裕，可是我两个兄长对这样的家境却非常冷漠。大哥靳思弼（后改名李自良），1925年在上海大学毕业后，就参加了中国共产党，曾担任过中共河南共青团委书记，1928年在开封被捕入狱，后被枪杀，现为革命烈士；二哥靳思傑（后改名金紫光），抗战开始在南京金陵大学毕业后，不辞而别，直奔延安去了。我在焦作任小学教员期间，父亲也病重医治无效辞世，家中的财富就交由大姐夫（他经营盐业）全权管理了。

1945年夏，因被国民党道清支部盯上，我决定离开家乡。一天晚上，我在向导陪伴下，摸黑直奔太行山上，受到我老同学的欢迎。他们开出介绍信，拟送我去抗大六分校学习，后来同乡同学靳尚江告诉我，晋冀鲁豫边区政府成立北方大学，校长是历史学家范文澜，延安还来了一些名教授，如罗青、艾思奇、刘大年、张光年、陈唯实、荣孟源、尹达、陈荒煤、吕班等，是解放区比较正规的综合性高等学府。于是我改变主意，直奔河北邢台，考入北方大学教育学院历史系（后来学校迁至山西潞城高家庄）。学校生活虽然艰苦，但思想没有负担，精神愉快，在校和另一同学办了一个《砥砺》墙报，闲暇时还自拉自唱京戏。在校方的鼓励下，我在同学中招揽京剧爱好者30多人，生旦净末丑都有，很快组建了平剧院，上演的第一个剧目是《逼上梁山》（我主演林冲）。范校长是浙江人，但他喜欢京剧，每当我们演出，他和夫人都到场观看。后来还为高树勋起义部队演出了《白毛女》（我饰演黄世仁）。

一年后，大约是1946年冬，在我们将要毕业时，晋冀鲁豫野战军派人来校选拔干部。第一批挑选了17名学员，我也是其中之一。

从学校到部队，在我思想上是个极大的跨越。我们背着背包通过平汉铁路敌人封锁线，到达河北与山东交界的馆陶，野战军组织部白冰科长（后改姓杨白冰，曾出任总政治部主任）与我谈话说：看了你的档案，调你去文工团工作，有什么意见？我就讲了自己对部队不熟悉，想去基层锻炼的想法。后来我就去了7纵队骑兵团，被任命为宣教干事。由于思想上有充足准备，很快就能和战士们融合到一起。

后来，7纵队和1纵队合并，政治部主任王辉球把我带到1纵队宣传部，这里办有油印小报，我经常下部队采访、写稿、编排、刻钢板、搞印刷，在自学中增长了不少新闻工作方面的知识。

我1947年1月入党，4月被调到晋冀鲁豫野战军刚刚建立的《人民战士》报社。同年7月，政治委员邓小平、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张际春发布报社人员政治命令，其中我被任命为助理编辑（至今我还保存着这份任命书的复印件）。从此，我就正式成为军队系统一名自学出来的新闻工作者。作为随军记者，经常下部队采访，随刘邓大军转战冀鲁豫前线，后来进驻南京城约半年时间，这是我参军后在一个地方住的最长时间了。

刘邓首长很重视报纸宣传工作。《人民战士》报刚刚成立，刘司令员就为报纸题写了报名，刘邓大军到了西南后，刘邓首长又将《人民战士》报扩编为《人民战士》出版社，既出报纸（连以上干部读物），又增出《人民战士》杂志（战士读物）。报纸是刘司令员题名，杂志题名应请邓政委来写。出版社领导把这项任务交我去完成。邓政委很爽快就答应了，一连写了四个“人民战士”，叫我们回去选一个就是了。

1955年，中央军委决定筹建《解放军报》，在各大军区抽调一批“秀才”来京，我们西南军区也调来十多人。在新调来的干部中，有上校、中校、少校和大尉军官，我当时是大尉军衔，在这批“笔杆子”中，我只能算个“小弟弟”了。在分配工作时，我提出对编辑部的内勤工作不太熟悉，我的身体强壮，还是搞外勤当记者下部队采访为好。领导认为我是从西南来的，就派我去成都军区组建记者组，我任组长，后来还兼任成都军区新闻科长。成都军区是个大军区，管辖四省一区的驻军（四川、云南、贵州、西康，后来西藏驻军也划归成都军区管辖），我在这里一干就是11年。其间，在福建前线采访一段时间，还到朝鲜志愿军总部任《解放军报》记者一年，直到志愿军从朝鲜全部撤军回国。在撤军前，周总理带领陈毅、张闻天、粟裕到朝鲜与金日成谈判撤军问题，我有幸跟随周总理采访活动一段时间，在《解放军报》上发表了独家新闻、通讯和照片。

1966年夏，“文化大革命”开始，我被调回报社，曾在“中央文革”《快报》组工作几个月。“文化大革命”期间，人们经历了史无前例的大浩劫，《解放军报》也毫无例外乌云蔽天。1967年初，报社总编辑胡痴被打倒，其中有一条罪名是“假”党员。胡痴是我的入党介绍人，无疑我也



成了一个“假”的，被关了起来。后来又节外生枝，一些说不清道不明的烟云笼罩着我。一直到林彪夺权的阴谋败露逃跑，在蒙古飞机坠落摔死，我才得以解放。

1978年，成都军区《战旗报》社缺少领导，军区首长对我较熟，就向总政提名要我去帮助工作。到职后，我出任军区政治部直属党委委员，《战旗报》社党支部书记、副社长，一干又是五年。1983年，我已62岁，超过了离休年龄两年，政治部主任与我谈话，想调我去政治部政研室搞调研工作。我谢绝了领导让我退居二线的好意，要求一退到底，让那些有才能的年轻人站出来发挥他们的活力吧！

1983年秋，我回到培育我成长、热情关怀我的《解放军报》社，很快进入了总政阜外干休所（在《解放军报》社院内，由军报代管）。有吃有穿，有房有医，还有干休所工作人员的热情服务，可以尽情去享受自己所希望的晚年乐趣了。可是刚刚离开工作岗位，失去工作的空虚感不时袭来，总觉得很不自在。此时，我二兄金紫光（时任国家文物局副局长）觉察到我的心思，提出让我写点东西，写写长征精神。他为我提供了很多资料。我自己也觉得虽然年纪老了，但智力尚未衰退，重操笔杆还不是太困难，于是就伏案写作。1991年，一本60万字的《伟大长征》，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。1992年，将过去随军采访的一部分通讯、特写、散文等编辑成册，题名《征程随录》，由长征出版社出版。1996年编著的《外国人笔下的中国红军》一书，又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。1997年，参加《陈奇涵传》（上将军衔）的编写工作，由军事科学出版社出版。2002年，在军事科学院副院长姜思毅的领导下，又参与编写《刘邓大军史话》，由解放军出版社出版。2001年，由军委副主席刘华清牵头组建一个庞大的“刘邓大军图文志编辑委员会”，黄镇夫人朱霖担任总策划，我被聘为副总编辑，编撰一部《天下之脊》（四卷八册），2004年8月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和四川人民出版社联合出版。

参加部队后，曾先后得到华北、中原、淮海、渡江、西南、西藏等各次战役、战斗纪念章以及抗美援朝纪念章；1956年获得由中华人民共和国颁发的解放奖章；1988年获得由中央军委颁发的独立功勋荣誉章；2003年，被总政治部直属党委评为“总政先进离休干部”，并颁发奖牌；2005年，获得由胡锦涛主席题写章名，由中央军委、国务院、国防部颁发的“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”纪念章。还曾获得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

协会颁发的荣誉证书和“老新闻工作者”证章。

本书出版之前，我曾写了一个简要的“后记”，中共党史出版社看过书稿后，建议将“后记”改为“前言”，并将自己的身份、经历以及与刘邓首长的关系体现出来。

作为刘邓首长的部下，我们之间没有直接的工作关系，中间还隔着很多层次哩。刘邓首长统率这支部队离开太行山南下，我们虽在首脑机关工作，也只能算是一个“小卒”，听命工作。不过在战争年代，司令部和政治部驻地都不太远，有时在田间地头经常碰见，首长还会主动打个招呼。我们总觉得两位首长清明廉洁、平易近人，他们和我们吃一样的饭，穿一样的衣，不同的只是在行军途中他们多了几匹骡马。

出版社要求我写自己的经历，使我陷入深沉的回忆之中。人们永远不会忘记自己的过去，随着自己经历的不断沉淀和积累，总结出经验教训，这就是历史。我们在京的老战友，虽然走起路来都有些蹒跚不稳，但见面就拍着大腿说：“我这辈子两条腿立了大功啦！”

从1945年8月解放战争开始，刘邓首长率领这支野战部队，从太行山的上党地区打出去，三出陇海，四跨黄河，转战冀鲁豫平原。在冀鲁豫皖苏五省交界之鲁西南一带，展开自卫反击作战，揭开了大反攻的序幕。接着，乘势千里跃进大别山，进行无后方依托的作战，给蒋介石造成极大的威胁。从大别山转出后，逐鹿中原，打了一场举世闻名的淮海大战，马不停蹄，又抢渡长江，占领国民党首都南京。然后，又直驱祖国的大西南，连续解放重庆、贵阳、昆明、成都、拉萨等大中城市。1952年9月，将五星红旗插在喜马拉雅山上。这都是靠两条腿走出来的。

人们常说三年解放战争，实际上刘邓大军在解放战争中整整打了七年。1949年10月1日，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向全世界庄严宣告：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”的时候，刘邓首长正在积极准备进军大西南。

在这漫长的七年中，刘邓大军跨越了19个省区，扫荡了大半个中国，从3万精兵发展壮大到120万大军，展现出惊天动地、波澜悲壮的战斗场景，反映出刘邓首长的雄才大略和恢弘气魄以及高超的指挥艺术。同时，也充分反映出广大指战员为了崇高的革命理想和信念，去英勇战斗，发挥了一不怕苦、二不怕死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。

近几年来，关于歌颂刘邓大军的作品有多种版本问世，也各具特色。

但是也有个别作品史实不够准确，夸大渲染，甚至有胡编乱造之嫌。比如在大别山反“围剿”斗争中，领导机关都已分散，我以随军记者身份一直跟随6纵队54团活动，后来曾经以日记形式写了一篇《九天强行军》的残酷经历。可是有一本书运用这个史料，竟将我写成团政委带领全团抗击敌人九天九夜的故事。这类不顾历史事实，随意想象描写，只能算是“戏说”、“演义”之类，如果作为历史读物，也只能算是赝品了。

老战友们心里都很郁闷，力主要把刘邓大军七年的历史连接起来，写出一部比较完整、准确而有可读性的军史来。大家扳着手指计算：我们有大量珍贵的历史资料；而这些已经公开发行的史料中，有不少又是我们这些老人所写；我们有耳闻目睹的感性素材。以刘邓首长为轴心，写出他们二人“气吞三山”的全貌，留给后人，这也算我们晚年应尽的一点义务吧。

但由谁来执笔完成这一任务，却遇到了周折，几位能操笔杆的老战友同声道出苦水：年迈体衰，疾病缠身，都有难言之隐。按照他们的说法，我却成了“壮丁”。其实，我的身体状况也不好，只能算个“纸老虎”。从年龄计算，我也将要跨进88岁门槛，还动过几次手术，体内还装有起搏器和支架呢！但如若把这个写作计划搁置下来，再耽搁两年，这些珍贵的历史资料，只有沉寂在脑子里和书柜里了，实在可惜。

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说过：“60岁以后才是真正的人生，青年时期增长才智，老年时期则会运用才智。”这话有一定道理，但不具普遍性。本人自知才智有限，但为了实现这一企望，不揣浅陋愿意努力一试。虽然还不及“老有所为”之说，也算发挥一点余热，走出我这辈子的最后一程吧！于是，鼓起勇气，重整旗鼓，眼力不济，就用放大镜辅助，最后在逯弘捷、吕小宁、宗荔三位同志的帮助下，为我打印和誊抄，花费两年时间才算完成。

刘邓大军在解放战争中，毫无疑问取得了辉煌的胜利。但是，也付出了重大的代价，伤亡和失踪约20万人。这些烈士和伤员们，都是解放军的优秀指战员，是人民的好子弟，人民将永远怀念他们。他们的功绩永垂青史。

本书写出之后，得到我的挚友乔希章的热情帮助，在中共党史出版社的极力支持下，终于顺利出版，特表衷心的感谢！

靳思彤

2008年11月20日

# 代序：开卷话刘邓

---

## 一、先言刘伯承

### （一）党中央给刘伯承的致敬信

敬爱的刘伯承同志：

我们，正在举行中国共产党的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七次全体会议的同志，谨以全会的名义，向您致以亲切的问候和崇高的敬意！

从1945年在延安召开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以来，您是历次党代表大会的代表，都当选为中央委员会委员。由于年龄和健康状况，您不能再参加即将召开的党的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，也不能再继续担任党和国家的领导职务。您对中国革命的贡献和崇高的品德，将为我们全党所永远怀念和敬佩。